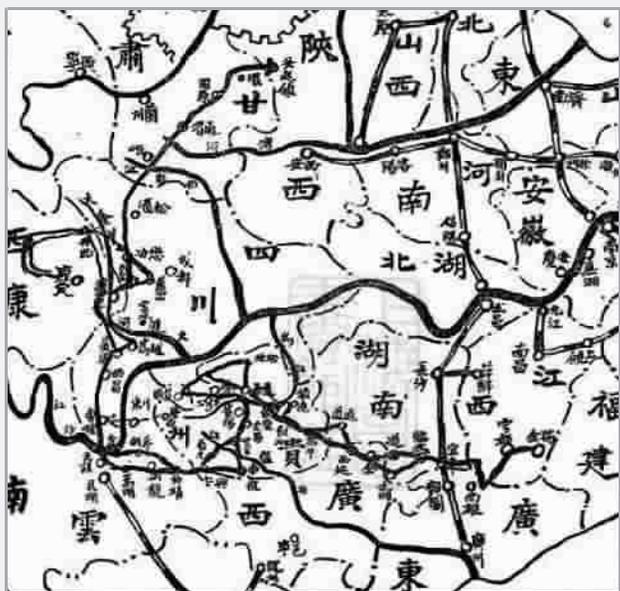


上海：长征精神的“扩音器”



《逸经》刊登的长征路线图(由江西瑞金至陕西吴起镇)

长征中的上海印记

本报记者 方翔

8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并由此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了世界发展的格局。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虽然不是长征的途经地,但是与长征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通过上海这个“窗口”,全世界都了解了长征。



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本版图片由上海图书馆提供

海外媒体大量报道

回顾中国新闻史,近代化报刊首先由外国人创办。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了外报在华的出版基地。上世纪初,上海拥有多家外国通讯社与外文报纸,包括路透社远东分社、合众社上海分社、美联社上海分社、塔斯社远东分社,英文《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正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伟大的史诗——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馆藏文献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海外媒体的长征报道。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览部副主任徐锦华介绍,在红军长征期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上海的许多西文报刊都对这一重要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大部分报道都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而沉寂在图书馆中,然而,抛开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后,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报道中挖掘出大量和红军长征相关的细节,也可以从国民党当局以及外国势力的动向当中侧面了解红军长征的深层意义。

为了此次展览,上海图书馆有关人员检索并阅读了大量报刊。上海图书馆助理馆员陈乐歆表示,当时,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常见于《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大陆报》等,这些报道可以勾勒出红军长征的大致面貌,甚至还

有不少曾经被忽略的内容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陈乐歆研究发现,在这些英文报刊中,不仅报道战况非常及时,而且在用词上也颇具特点,像《密勒氏评论报》中描述红军所用的英文就是“Red”、“Reds”。虽然受到当时整体环境的影响,这些报纸上也有“悬赏”之类的消息,但是“长征动向”“呼吁抗日”等内容还是对于宣传红军、宣传长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1934年10月10日的《字林西报》中,就介绍了红军多位主要领导人;1935年5月18日的《大陆报》,介绍红军从云南进入四川的战况;1936年7月15日的《北华捷报》上,有红军各主力已全部渡过黄河并摆脱堵截报道。

陈乐歆还发现《密勒氏评论报》对长征的报道非常详尽且具有研究价值。比如,1935年6月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中,介绍了红军渡过金沙江;1935年9月7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中,提到蒋介石计划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围剿西北的红军;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中,分别有斯诺采访毛泽东的报道以及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沪上出版功不可没

1937年7月,幽谷所著《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冲破了国民党

的新闻封锁,刊登在上海出版的文史类半月刊《逸经》上,这在当时实属不易。在此次上海图书馆的展览中,不仅有当时《逸经》的原件,还有其他转载的出版物,比如由夏丐尊和叶圣陶主编、开明书店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当时转载《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并改名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1937年,大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二万五千里西行记》,作者署名化名为“赵文华”。

“在我们这次的展览中,各类出版物是一大亮点。”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览部主任刁青云说,“据我们的研究,当年许多在海外出版的长征报道,当时在中国国内是几乎不可能发表的,但是通过书籍出版,这些有关长征的信息为人们所了解。像《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很快传到国内,先后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印行,现发现的有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从东南到西北》、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3月出版的《随军西征记》、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的《长征两面写》、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6月出版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随军西行见闻录》连载版和单行本等等。”

上海图书馆助理馆员刘巍介绍,此次展览中,有不少当年上海本土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革命故事、《西行漫记》的多个中文版本、长

征回忆录等等。

今天,我们翻阅当年的史料会有不少有意思的发现,像1937年夏,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文摘·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文摘》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曾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玲》,文中最早公开披露了《长征回忆录》的编辑情况——“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集成一部长篇巨著;这篇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剪裁,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这里提到的“长征中的史实”,就是后来出版的《红军长征记》。

上海与长征从未远离

20世纪30年代,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层在上海壮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构成了城市大众群体。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陈建云教授看来,上海是当时东方最大的都市,市民社会成为近代出版业最初和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和土壤。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深厚,但它却有得天独厚的一面,既依托江浙文化之基,又凭借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汇中心之利。得益于整个文化氛围的上海出版业,同时也帮助了上

海都会文化的整体构建。

1934年6月,《少年真理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原为共青团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同年10月底改由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这份报纸于1936年春首先宣传长征。这份油印报纸从第110期起分7次连载西屏的《中国红军的铁流》,其中生动叙述了长征的相关情况。为了进一步满足读者需求,《少年真理报》于同年9月出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小册子,它以手写体印刷,收入西屏的《中国红军的铁流》和李璜的《红军西征是怎么胜利的呢》两篇文章。

1937年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黄峰编的《八路军行军记·长征时代》,这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新闻记者对陕北的采访实录,如范长江的《解放了的劳动》;二是长征亲历者的自述,如《雪山行军的插话》和《长征日记》;另外,还有幽谷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和白华译的《红军小史》等。

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吴海勇看来,从地理上说,长征所经之处与上海相隔很远,两者似乎不搭边。但事实上,上海与红军长征也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都会,长征精神在上海得到最初提炼,并发挥影响。文化大都会吸引人才的同时,也造就人才。上海在宣传长征精神方面的重要影响力,也倍加受到重视。

“长征的路我们还在走！”

——红军著名将领后人代表座谈会侧记

“80年过去了,我们再谈长征,意义和内涵已经扩展了。长征我们现在还在走,思想上、精神上的长征是从中共一大开始的。”

在昨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后人代表座谈会上,朱德元帅的孙子、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朱和平这样说。

这不仅是朱和平的心声,同时也是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粟裕大将的女儿粟惠宁、儿子粟寒生等10多位参加座谈会的红军将领后人

多次提到的。他们说,在新的时代,仍然要学习红军精神和革命精神,这样的精神对后人依然有鼓舞和激励的作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

那么怎么让革命精神传承下去?他们反复地向自己。红军将领后代自小看到先辈们的奋斗,耳濡目染。萧华上将的长女萧雨讲道,长征一直是父母心中的丰碑。当时媒体反复向父亲约稿,父亲却一直很忙,没时间写作。直到1964年他患肝炎到杭州养病,决定以诗歌的

方式讴歌长征胜利。他的心血和情感都沉浸在了创作当中。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提到,许多人是听着《长征组歌》长大的。尽管现在的年轻人离长征的岁月很遥远,与老一辈之间不可避免有了代沟,但一位将领后人代表说,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把革命精神传给下一代、再下一代。

2016年,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不仅要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还要努力站上世界的高地。与会人员表示:“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座谈会在众人齐唱《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歌声中结束。

首席记者 邵宁
实习生 吴紫涵

八位上海老红军获颁长征纪念章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丁绍学)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将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名义,为1937年7月6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健在的红军老战士和老同志颁发“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昨天一早,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张晓明、政委马家利,亲切看望慰问了现居本市的老红军和老红军家属遗孀,感谢他们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作出的贡献并向老首长、老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八位现居上海健在的老红军收到了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